

《琵琶记》研究·十三 说牛丞相

黄仕忠

牛相是琵琶记中一个简单而复杂的人物。

说其简单，他出场不多，并且被看作是一个否定人物，似无争议。说其复杂，在于如何给牛相一个“定位”：相非贤相，父属严父；一定要招伯喈为婿，蔡家灾难由他造成；最终仍让伯喈迎亲及归守庐墓，也不得全部归罪于他。故虽含贬抑，但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仍可议说。而明人眼中的牛相，与今人眼中的牛相，也仍同中有别。

按照时行的看法，牛相作为统治集团的代表，实际上是蔡家灾难的制造者。这样的否定性人物，除了加以批判外，无须再加词说。倘我们再从中找出一些可以同情与理解的内容来，恐怕难免使人惊诧了。

我们从历史人物、剧中人物、作者三者的关联中，探讨过高则诚的“创作缘起”与“创作意图”。历史人物在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背景下，因“名高”而被迫为官，结果遭致“名浇身毁”的人生悲剧，与剧中人因赴试中状元而归养不得，招致家破人亡、身陷不孝薄幸的结局，有着同构的关系。高则诚本人身处元代末世，社会政治腐败黑暗，他从早岁的热衷功名、希冀一显身手，到始知功名乃忧患之始，并拒绝方国珍的强邀而解官归隐，却又并未脱出方国珍的势力范围，这种背景与心境，对于他有感于蔡伯喈的故事而创作《琵琶记》，自然会有某种联系。所以我们说《琵琶记》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对元末统治与现实的批判。这种隐约的含义，对于高则诚同时代的文人词客，或许不难体悟，他们会从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背景中，从蔡邕的人生悲剧中去认读与补足，并据元末社会状况，从高则诚在方氏势力之下的特定处境，获得

与高则诚会心的一笑；而普通观众则不然，只会从故事场面中直观地去理解，而并不一定“另作眼儿看”。

方国珍对高则诚的“邀留”，也是类同于戏中对伯喈的“强官强婚”的“好意”。伯喈“畏牛如虎”，而牛相其实并没有真的拘系着伯喈不放，后来不仅同意了女儿迎亲的要求，甚至还同意女儿一同去守墓。或许牛之可畏，正需从蔡邕之于董卓，高则诚之于方国珍的关系中才能体悟吧。但文学毕竟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学不是影射，影射的也不是真文学。历史人物也好，高则诚也好，我们只能说在上述角度与层面上，他们与《琵琶记》的创作缘起及情节设置有某种关联，却并不能将两者径加等同。郭沫若说“蔡文姬就是我”，他写《蔡文姬》，就是因为他自己的经历与文姬有共同之处。但遭际与感受的相同，并不能据此而对号入座。《琵琶记》中的蔡伯喈故事，既然是从《赵贞女》负心婚变故事改变而来，则蔡伯喈与蔡二郎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与历史人物有了一定的距离。剧中人物只是按照故事发展的趋势和自身的性格而行动。虽然作者尽可能把历史人物的某些事实移用到戏中，更多地把历史人物的性格与品德贯注到戏中人物中去，使两者之间有了某种同一性，但也仍然不过是依稀仿佛而已，并不能完全等同。惟其如此，人物仍自人物，历史仍归历史，读者自然也只就其所见而生发共鸣，只认可作品世界自身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虽然中国传统讲究“知人论世”，但所“知”的角度也仍各不同：既可从历史的角度去知，也可以从原故事的负心与否的角度去知，还可以从作者所声称的关风化的角度去知，遂有关于《琵琶记》的种种歧异的见解，并且各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回过头来说，蔡伯喈尚有历史人物作参照，而牛相却是子虚乌有的了。他既非董卓，亦非方国珍或居于牛渚的不花丞相，他只是《赵贞女》故事中的丞相在《琵琶记》中的延续。因而也可以说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丞相而已。高则诚是配合着蔡伯喈的新故事来写这样一位丞相的。所以不妨姑且撇开历史与现实，只看作品中的具体描写。

牛相直到第六出才出场，但第三出牛氏规奴的行动中，便已未见其人而已感觉到他威势了。他“势压中朝，富倾上苑”，更以严格的家教教育女儿。从这位只知读《列女传》、做女工，既不到花园游赏，也不知伤春为何物的牛氏小姐身上，也可见牛相教育的“成功”。这一点上，牛相比《西厢记》中的老夫人，《牡丹亭》中的杜宝高明得多了。因为莺莺做出“丑事”，实与老夫人的放任有关，正如“拷红”一折红娘所责问的一样；而杜宝也是失败的，他禁止女儿午睡、游花园，却仍不能抑制少女春心的萌发，遂至丽娘因游园而一梦成病。牛相却是使得女儿根本不对园外的春光有所动心。“把花貌，谁肯因春消瘦？”“任他春色年年，我的芳心依旧。”（第三出）杜宝请陈最良教的是《诗经》之《关雎》篇，虽云“后妃之德”，却易生“好逑”之想；丽娘聪敏过人，正犯女子有才之忌。而牛小姐却是以《列女传》为伴，以女工为本分，以做一个贤妇为目标，故能“啼老杜鹃，飞尽红英，端不为春愁。”反怪惜春：“春光自去，你有什么闷来？”面对燕飞蝶舞莺语，却道是“你是人物，说那虫蚁作什么？”使惜春无话可说，只好自叹“我好没来由”，当然也就做不成送信的红娘了（第三出）。

第六出牛相上场，先是打跑了张尚书、李枢密家来做媒的媒婆，声称女儿非状元不嫁；接着又为使女游园之事，把女儿与老姥姥、惜春叫来训斥一番，劝女儿守紧闺门，免得玷辱了名声，可谓语重而心长。在这里，牛相的作为，实在是严而有节，庄而有理，虽未见其调燮阴阳的手段，但就其治家而言，在封建时代却也是可堪称道的。这不仅与老夫人的治家无方、杜宝的刻板迂腐不同，与《张协状元》的黑相、《荆钗记》中的万俟相的一味用蛮也不同，善用其威而又不使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才能强赘伯喈入府而仍安然无事。

有牛相的教导，方有牛氏的“性格温柔”、通达贤惠，才有牛氏的谏父迎亲、不妒而认五娘为姊妹，从夫守庐墓，为蔡伯喈故事从《赵贞女》的负心婚变，转化成一夫二妇同受旌奖结局，奠定基础。

牛相“极富极贵”，位极人臣。他惟一的缺憾，便是“回首庭前，凄凉丹桂好伤怀”。夫人去世，只有一女，长大成人，未曾婚配。他的想法是：“我

的女孩儿性格温柔，是事实会，若教他嫁个膏粱子弟，怕坏了他；只教他嫁个读书人，成就他做个贤妇，多少是好。”舍膏粱而取书生，他为女儿所想也不可谓不周到了。正因为牛相早有这样的声口，所以新科榜发，皇帝也愿成人之美，见到蔡伯喈好人物、好才学，便让牛相招之为婿，并愿主媒。牛相也显得很大度，道是“不须用白璧黄金为聘”，只要答应一声就可以了。因而如媒婆所说：“一来奉圣旨，二来托相公威名，三来小娘子才貌双全，是人知道”，蔡伯喈应是喜从天降，趋之唯恐不及才是。不料，蔡伯喈竟然拒绝了！“听伊说叫人怒起，汉朝中惟我独贵，我有女，偏无豪家匹配！奉圣旨命我每招状元为婿。”牛相此时发怒应是可以理解的。但一怒失态之后，他马上再问原由，当听知伯喈“待早朝，上表文，要辞官家去，请相公别选一佳婿”时，牛相“〔笑介〕他原来要奏丹墀，敢和我厮挺相持。”略一沉吟，道是：“我如今去朝中奏官里，只教不准他上表便了。”（第十三出）

这里，牛相一怒，一笑，又一沉吟，便构成了对蔡伯喈命运攸关的“强官强婚”。牛相这一笑的潜台词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在明知蔡伯喈有妻室，道是“再婚重娶非礼”的情况下，仍要招伯喈为婿呢？

高则诚并无更明确的交代。故令人疑窦丛生。陈眉公评本批云：“进士中岂无一人足以做丞相女婿者，何以执拗若是？”（十四出总批）李卓吾评本一则云：“辞婚不合先说。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机事不密，反害于成。蔡伯喈原有腐气。”（十三出总批）再则云：“不是牛太师不是，还是蔡伯喈太腐耳。怪他不得，怪他不得。”（十四出总批）

通行本试图对此有所补救，故将牛相“笑介”这一科介指示删去，并下二句作一曲【前腔】云：“他原来要奏丹墀，敢和我厮挺相持。细思之，可奈他将人轻觑。我就写表奏与吾皇知，与他官拜清要地，务要来我处作门楣。”而将原曲之“合”改作众唱之尾声。故牛相此处非笑乃怒。清毛声山评本即谓此处乃是“再闻而愈怒”；原因似乎便是“可奈他将人轻觑”。但已知伯喈“将人轻觑”而偏要将女儿嫁与，才真正是“牛气”而且不可理解了。至于说“与

他官拜清要地”，其实上文已经明说“官为议郎”便已是“任居清要”，何况下文并未另予官职，则此语便落空了。所以这种改动并不成功。

凌初成批云：“此与第二换头前段正同，而‘圣旨’下又少数句，不合调，岂有脱误耶？时本因其不合，而于‘相持’下添‘细思之，可奈他将人轻觑。我就写表奏与我皇知，与他官拜清要地，务要来我处为门楣。’遂割‘读书辈’以下为【意不尽】。及细核之，只与第三换头字句不合。及查《千金》、《寻亲》，皆古传奇，而【双溪^鴻】各与此不同，最不可晓。今姑从元本，缺疑以俟知者。”或许这里的处理，向来便有不同的理解，故早就有所改订而难以抉择耶？

李卓吾的评说从一个角度切近底里。这便是伯喈之迂腐。这位草莽秀才初入京师，得中状元，骤降喜事，归留难断，惶惶不知所措，对议亲更是喜惧莫名，语无伦次。请看“议亲”出，院子、媒婆初来议婚时，他说是“自有正兔丝和那亲瓜葛”；再劝时他道是“妻正青春，那更亲鬓垂雪。”三劝时则说：“自小攻书，从来知礼，忍使行亏名缺。父母俱存，娶而不告须难说。悲咽，门楣相府须要选，奈虞彦佳人难存活。”从断然拒绝到转口云“娶而不告须难说”，只是对相府门楣必须选和虞彦佳人难存活的两难关系有所不忍而已，可知也不是毫无所动。这里有腐气的一面，也有对功名富贵的掩饰不住的心动。从成亲出伯喈所唱“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的曲句，便可知伯喈确有过“思想动摇”的时刻。从“高大全”的孝子标准来说，这种想头当然易受讥评；但从人的性格与心灵的刻画的深刻之处而言，却是极其准确而鞭辟入里的。如果伯喈只有孝的理念而没有人的欲望，一切惟孝而动，便只是一个图解的傀儡；只有通过种欲望与理性的冲突的真实描摹，才能写出活生生的人物。同样，从这一个角度，我们可以体悟到牛相从一怒，到一笑，再到作出不允伯喈辞婚决定的复杂心理。一怒，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伯喈竟然会拒绝，他的惟我独尊的自尊性格受到极大的刺激；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听清楚伯喈辞婚的理由，只听到辞婚二字便“教人怒起”了；但这位老练沉着的当朝丞相马上察觉了自己的失态，所以紧接着再问：“不知他回话，有何言语？”当听清楚辞婚的理由只是什么“父母八十年余，已娶了妻室，再婚重娶非礼。待早朝，上表文，要辞

官家去，请相公别选一佳婿”，他不禁莞尔一笑。这一笑可以看作是对伯喈心理的这样一种透视：父母年八十余而仍来赴试，可知功名心切，辞官当是言不由衷；既谓已有妻室，却又道是“再婚重娶非礼”，“娶妻不告，实难从命”，则重娶的主要问题也只是不告父母而已，并非真的不能选作相府门楣，一番推托，不过是“知礼”的书生应有的姿态而已，今有皇上为媒，大可抵消这一顾虑；而已有妻室之事，牛相根本就不打算放伯喈回去，“何必顾彼糟糠妇？”（几言谏父出牛相语）至于上表文辞官家去，与当朝丞相厮挺相持，岂不如螳臂挡车，令人失笑了。这里牛相“笑介”两句之后作：“〔合〕读书辈，没道理，不思量违背圣旨。只教他辞官辞婚俱未得。”在宋元南戏中，这“合”是场下帮腔合唱，而不是场上合唱的；此处即是场下帮腔评说此事，牛相不参与合唱。即在后台帮腔合唱时，牛相作沉思介，待合唱毕，牛相主意已定，便吩咐道：“院子，你和官媒再去蔡伯喈处说，看他如何？我如今去朝中奏官里，只教他不准上表便了。”牛相让人再探伯喈的意思，是相信伯喈推辞之后，便是接受；而他自己先上一章，不准伯喈之请，也是让伯喈没了推托的借口。所以圣旨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为由，命伯喈“尔当恪守乃职，勿有固辞。可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加上伯喈的奏章中并未提及已有妻室之事，只提父母年迈，“不告父母，怎谐匹偶？”则皇上为媒，足可以代父母之命，诚然是“把乘龙婿招，多少是好”了。如此看来，通行本删“笑介”，即一味强调牛相之怒，恰恰的把牛相给简单化了。因为“再闻而愈怒”的心态，下接的应是《张协状元》的黑相怒贬张协，《荆钗记》的万俟相怒贬王十朋式的推牌了。老谋深算的牛相不应如此。

牛相的强婚，从其自身情况考虑，一则是蔡伯喈确实是好人物好才学，况且是新科状元，又有皇帝为媒，奉旨成婚，而牛相只有一女，他等待着女婿这半子的身份来延续自己的权势。二来前已不许张尚书李枢密提亲，声言非状元不嫁，“怕人传，道你是相府公侯女，不能够嫁一状元。”（十四出老姥姥语）他后来对此作了检讨：“只因一着错，输了一炮落。自家当初不仔细，一定要招蔡伯喈为婿。”（散发归林出白）确实是太“不仔细”了。也许当初一心想招状元为婿，声扬于外，骑虎难下，以至求之过切，一时匆促，所思未周吧。

从戏中的具体描写看，到此为止，牛相的行动也都是于情于理可以理解的。他对于女儿的要求，为女儿选佳婿，必欲求而得之的行动，都是出于一种“好意”。然而在另一条线索上，蔡家已因伯喈被强官强婚、稽滞不归而陷于灾难之中。牛相实际上是蔡家灾难的制造者。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这一切呢？

撇开影射东汉末世或元蒙统治之说，以及讥方国珍或不花丞相说，以戏中的实际描写而论，也仍可读出一种典型的涵义。

牛相成为悲剧的制造者，并非是出于蛮横残暴，亦非是奸邪佞恶，而主要地是一种“自私”。因为位极人臣，惟我独尊的身份，他眼中只有自己的要求与利益，而无视别人的需要。他招蔡伯喈为婿，便是他看中了蔡伯喈“好人物好才学”，这个评价虽然出自皇帝之口，却是深得牛相之心的。牛相根本不屑于门当户对的张尚书李枢密，却选中了这穷秀才，也不是看真的不惜降尊纡贵以接纳蔡家这样的穷亲家，而是他根本就把蔡伯喈与蔡家割离开来了。他要的只是中了状元的蔡伯喈。以泰山的权势，门第高下，已无关宏旨；惟其低微，方能使其更加感恩戴德。从几言谏父出牛相的厉斥：“唯！吾乃紫阁名公，汝乃香闺艳质，何必顾彼糟糠妇，岂肯事此田舍翁！”可见牛蔡两家毕竟是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虽然牛相并没有明确地说不让伯喈派人回去，也没有派人监视着伯喈，但他也确实没有想过让伯喈回去，也从来不曾关注过穷亲家。他意中只有伯喈是他的女婿，却从没想过自己的女儿也是人家的媳妇，有尽孝的责任。甚至蔡氏父母死后，他还发脾气，道是“我的女孩儿，如何与别人带孝？”（散发归林出）他意中，既然蔡家让儿赴试，伯喈便不再属于蔡家了：“既道是养儿防老，何似当原休教来赴试不好？”至于奉养双亲，“既有媳妇在家了，他孩儿不去也不妨。”（几言谏父出）所以，牛相虽无意于给蔡家以灾难，但移走了蔡家惟一的支撑，灾难便不可避免。

牛相甚至认为蔡伯喈入赘牛府也大半出于自愿。他说：“有缘千里能相会，须强他不得。”（几言谏父出）这可证上文关于牛相“笑介”时的心态分析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他以为伯喈不过是假意推辞而已。他根本不认为自己强

迫过伯喈，故不仅以为自己毫无责任，甚至还怪伯喈：“彼久别双亲，何不寄一封之音信？”直到牛氏点出伯喈是“只要保全金榜挂名时，事急且相随”，即惧于当朝丞相之威势，为保全功名与前程，不得已而相从，牛相这才无话可说。

一种“反讽”，在于恰恰是被牛相以礼教严格教育出来的女儿，却以礼教的纲常作支持，揭穿了牛相的自私心态：“父居相位，怎说着伤风败俗，非礼的言语？”使得牛相恼羞成怒：“这妮子无礼！到将言语来挺撞我。”只得自解道：“夫言中听我言违，料想孩儿识见迷。”“几言谏父”出父女之间凡“十八答”，针锋相对，堪称精彩。徐渭说：“句句是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南词叙录》）牛氏的“上纲上线”的话头，原属迂腐可笑，只有用在对付这位身居相位，处处以礼教训人的严父身上，才是痛快淋漓，显出“点铁成金”之妙来。可惜这种徐渭意中的“常言俗语”，当世代变换以后，在人们眼中，却已成为“赤裸裸”的礼教宣传了。可知对礼教的过分“敏感”，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于作品涵义的正确理解和作品妙处的欣赏。

但牛相毕竟是一位有涵养的老丞相。回头细细一想，女儿的话虽然“难听”，却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暗中思忖觉昨非，有个团圆策”，即派人迎接伯喈双亲来京（第三十二出）。所以陈眉公评云：“这一出，牛之罪全担伯喈身上去了。”但牛相的做法其实也仍只是从自己角度考虑的。他说：“待放他（牛氏）去（陈留），只是幼长闺门，难涉路途；况兼自家年老无人，如何放他去？”他并未想一想，伯喈年过八十的父母，又如何经得住路途的跋涉呢？当然对于这位“炙手可热”、势压中朝的当朝丞相，能想到这些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同样，当五娘来京，知伯喈父母双亡，夫妇三人要一同归守庐墓，牛相也不是马上就同意的。他对老姥姥说：“不中，我的女孩儿，如何与别人带孝？”甚至威胁说：“我不教女孩儿同去，又待怎地？”只是在老姥姥“事须近理，怎挟威势？休道朝中太师威如火，更有路上行人人口似碑”的劝说下，他才只好自吞苦果：“当初是我不仔细，谁知道事成差池？念深闺女多娇媚，怎跋涉万余里？我嫡亲有谁？怎生分离？休休，不教

爱女担烦恼，也被旁人道是非。”无可奈何，才说：“由他去，我管甚么闲是非？”这里牛相与老姥姥商量的口吻，与在伯喈夫妇面前的姿态颇不相同。前者是私己之谈，颇涉自私之心；后者则须保有丞相的体面，故说得十分堂皇，不失贤相口吻。如他与牛氏相争时曾谓“何必顾彼糟糠妇”，而与五娘对面时却极口称道说：“贤哉！贤哉！”热情地说：“你今日无父母，又无公姑，你便是我孩儿一般。”让五娘与牛氏姊妹相称。此种地方，可见《琵琶记》的描摹，可谓细致入微，含有大量的潜台词，而与一般民间戏曲的率直颇不相同，读者细味自可得之。

牛相的“转变”，可以说是为女儿考虑的结果。正如他的“强官强婚”是为让女儿嫁一个会读书的状元郎一样。老年人爱女心切，或许亦是人之常情吧。牛相年事亦高，膝下只此一女，却放她去陈留守孝三年，也算是一种牺牲了。送别时他说：“辞别去你的吉凶未凭，再来时我的存亡未明。伯喈，吾今已老景，毕竟你没爹娘，我没亲生，若念骨肉，须早办回程。”《词坛清玩琵琶记》引汤显祖评云：“丞相未是不贤，只为舍不得儿女，实至情也。看此相别，孑然一牛，十分凄然。”在伯喈父母双亡，伯喈别无牵挂之后，牛相完全认同了蔡家的一切。他更希望伯喈“念骨肉一家”，“早办归程”。而此时，伯喈的荣耀也就是牛相的荣耀，所以“一门旌奖”，其实是必然的结局。当然牛相顺便也为自己办妥了取女回京之事：封赠以后，让伯喈“限日下到京”，便可以回复牛府的正常生活了。牛相高兴地对伯喈说：“孩儿，数载艰辛虽自苦，一旦荣华人怎知？”以为这旌奖足以抵得过三载的辛苦。只是他仍然无法理解这位孝子欲尽孝终养而不得的心境，伯喈道是：“儿不孝有甚德？蒙岳丈特主维。呀！何如免丧亲，又何须名显贵？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心中的缺憾依然难平。各样的人物，仍按各自的性格而行，这种性格化的语言和丰富的潜台词，是《琵琶记》的擅长。而《琵琶记》所展现的悲剧，似正在于各种不同的人物，依各自的性格而作出的行动之中，在其相互关系的运作之中形成。

照此说来，牛相也不是一个“恶人”。他的“转变”似乎又使“牛之罪全担伯喈身上去了”。岂非《琵琶记》并没有真正的坏人，而且谁也没有过错

了？这是否是取消冲突了呢？从阶级对立的角度理解《琵琶记》的冲突，高则诚似乎使得悲剧冲突“消解”了。但从高则诚所肯定的伦理纲常的角度而论，却正是封建的伦理纲常内在的矛盾，构成了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君臣之间、功名与尽孝之间的冲突，使蔡伯喈从父从君的合于礼教的行动，成为悲剧发生的契机。从肯定礼教而关风化的角度出发的描述，结果却归于揭示了礼教本身的矛盾，从中透出的是对于礼教的否定意义。这是高则诚的无意中的“偶然”呢？还是高则诚有意而为之？还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胜利”？究竟是一种明确的以阶级对立为表现的冲突更加深刻呢，还是从一种无可违抗的命运般不可究诘的伦理纲常中体悟的悲剧冲突更加来得深刻呢？这只能由读者见仁见智了。高则诚只是说道：“知音君子，这般另作眼儿看。”至少我们可以说，在《琵琶记》改变了《赵贞女》的主题与后半情节之后，在取消了《张协状元》、《荆钗记》等的丑角搬演的丞相之后，在以外角搬演的丞相身上，也依然可以读出更加深刻的意义。从个人的邪恶，转向一种制度、一种社会组织和道德观念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灾难，转向对人性弱点的揭示，而不是简单化的恶人作祟，应当说是更加深刻，而不是相反。而且，明清人眼中的牛相，毕竟不同于今人以阶级对立观念观照下的牛相，他们更多地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丞相来理解牛相，感悟人物的意义的。

对牛相的否定不及人们预想的那么坚决，是否意味着对牛相或统治的歌颂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琵琶记》总体上对统治还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的。剧中虽说是“全忠全孝蔡伯喈”，其实只是强调了孝而并未有对忠的渲染。剧中虽然没有对牛相如何“禁拘”着蔡伯喈作正面的描写，但也让伯喈对官场的处境作了表露：“【红衲袄·前腔】我穿着紫罗襴到拘索得我不自在，我穿的皂朝靴怎敢胡去踹？我嘴里吃几口荒张张要办事的忙茶饭，手里拿着个战钦钦怕犯法的愁酒杯。到不如严子陵上钓台，怎做得杨子云阁上灾？只管待漏随朝，可不误了秋月春花也？枉干碌碌头又白。”到是这种地方，隐约可见蔡邕在董卓治下和高则诚在方国珍势力范围中的处境与心情；也可以说是封建时代官场生活“伴君如伴虎”的典型写照。在《琵琶记》中，功名确实是与忧患与灾难联系在一起的。但无论在元末还是在明代，都不可能允许对统治有直接的接露与批判，《琵琶记》只能作一种隐约的暗示，即使将牛相改作奸相敷

以白脸扮以丑角，也依然只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因而对于作者可能有的感发，与作品实际传演中被理解的涵义，应当有所区别地对待，对任何一方面的过分强调，或认为非此即彼，都是不恰当的。

“极富极贵牛丞相”，题目四句中惟一非评价性的句式，给人们留下想象的空间，对《西厢记》的老夫人的评价，从过去视作封建家长的代表，抑杀爱情的罪魁，到今天认可她的想法是封建时代正常的观念；以及理解《牡丹亭》的杜宝教女的行动，并将杜宝也作为封建思想的受害者，说明非此即彼的对立逻辑正在被抛弃。平心静气地理解牛相这样的人物，也应是题中之义吧。

厦门大学图书馆